

黄道周年谱考评

侯真平 姜曾泉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等，号石斋等，福建漳浦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朝，累官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刚正不阿，犯颜屡谏，名震天下。弘光朝，官至礼部尚书。隆武朝，以武英殿大学士辅政，自请募师北上江西抗击清军，兵败婺源，不屈而死，是个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还是明末儒学大师，一生精力主要用于治学授业，有《榕坛问业》、《易象正》、《黄漳浦集》等著述百余种；子弟众多，其中最著者如方以智、彭士望、张履祥等。同时，他又是大书法家，近代以来著名书画家沈增植、潘天寿、来楚生、诸乐三、沙孟海等就是直承其风的。

黄道周年谱，笔者知见凡6部：（一）明洪思《黄子年谱》（以下简称《洪谱》），（二）明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庄谱》），（三）清郑亦邠《黄石斋年谱》（以下简称《郑谱》），（四）清黄玉璘《黄忠烈公年谱》（以下简称《黄谱》。疑即《洪谱》或《庄谱》，详下。），（五）清庄亨阳《黄忠端公年谱》（非原谱名，且疑非所撰，详下。以下简称《亨阳谱》），（六）清金光耀等《先儒黄子年谱集成》（以下简称《金谱》）。现逐一考评如下：

一、《洪谱》

作者洪思（1633—1704），别名浩士、阿士、石秋，私谥文晦，福建龙溪（今属漳州市龙海县）人。父京榜，字尊光，

崇祯六年（1633）已在漳浦北山执业于道周，随后两年又从学于漳州（“榕坛”等地）并掌门人修业事，参与编校《榕坛问业》。十三年，成举人。十六年，参加校刊道周《孝经集传》等书。十七年十月，护送道周北赴弘光朝召用，途中随游武夷山而归；道周为撰《洪尊光〈易洪图〉〈孝经洪图〉序》。隆武元年（1645），加入道周抗清义旅，任中书舍人兼监纪推官。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周在江西婺源壹都明堂里兵败被俘，京榜脱逃回乡，着道士服隐居深山，与子洪思共同搜集整理道周遗作。康熙四年（1665）以前已不在人世。临终叮嘱洪思完成道周遗作搜集整理工作。还著有《邱园集》等。崇祯十七年，洪思以11岁（虚岁十三）之龄，随父出席道周主持的邗山讲问大会，舟中道周为授《孝经》并为所撰《洪图赞》、《九口诗》作序跋。明亡，隐于龙溪苦竹山敬身屏，杜门著书，并承父志及道周遗属蔡玉卿、黄子平之托，继续四出搜访道周遗作并研究整理之，于康熙四年以前先后编成《黄子文集》88卷、《石斋十二书》196卷，并在该年以前依据这些丰富的资料撰成该谱，以及《黄子传》、《文明夫人行状》、《收文序》等。所搜集的遗作之多，研究之细致，在历代收集整理者中首屈一指。另著有《洪图六经》、《洪图六史》、《石秋子敬身录》、《石秋子诗集》等。逝世之初，友人郑亦邹（即《郑谱》作者）为撰《洪石秋子传》。

洪思虽以冲龄问业于道周，而且由于道周旋即北赴弘光朝、隆武朝召用乃至就义，所以从此无缘再追随左右，但是所撰该谱是在其父子长期搜集研究道周遗作以及父亲随侍道周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所述基本可信。该谱行文多取道周原文，而且《黄漳浦集》保留的许多洪思注释和其父京榜的追忆，均可证明其父子对道周遗作一起进行过研究，并且采入该谱。然而，由于清陈寿祺在所校《庄谱》的卷首按语中说《庄谱》作者庄起俦“尝偕先生出师建阳而归，尤多目见之事”，遂使读者可能误以为

《庄谱》所记“尤多目见之事”，孰不知庄起俦和洪思同期及门，而且起俦随征仅迄建阳而已，道周义旅在建阳尚处在初期的召募结集时期，而洪思之父崇祯六年即已为道周执掌门人修业之事了，况又随征直至婺源兵败之日，父子俩又长期搜集整理道周遗作，所以即使仅就资历而言，起俦也无过于洪思父子，因此起俦“尝偕先生出师建阳而归，尤多目见之事”并不足以作为判定《庄谱》高于《洪谱》的依据。况且，笔者认为《洪谱》早于《庄谱》，《庄谱》是为订补《洪谱》而撰的（就此而言，《庄谱》有过《洪谱》之处），但《洪谱》仍有优于《庄谱》之处，详见下文《庄谱》条。

笔者认为《洪谱》成于康熙四年以前，是因为洪思《黄子传》和《收文序》都说该谱被收入所编《石斋十二书》中。其中，《收文序》说“二十年漳上乱如雨……今黄子以忠孝示天下而天下尸祝之将二十年所矣”，考道周就义于隆武二年春，此后20年便是康熙四年，所以《收文序》及《黄子传》、《石斋十二书》均成于康熙四年以前，而附入《石斋十二书》中的《洪谱》当然也成于该年之前。

二、《庄谱》

主要作者庄起俦，字子鹤，与洪思同乡。父庄烈，天启二年（1622）成武进士，与同年进士道周在京师有所过从。崇祯十七年五月邗山讲问大会期间，起俦始执弟子礼于道周（洪思也在这时入道周门）。次年七、八月间，加入道周抗清义旅，并在建阳劝道周屯守闽北而不可轻率北上江西抗清，不为所听，遂以养母辞归（可证其父已死）。行前，曾与赖继谨晤谈（赖氏后从道周就义）。后参与疏请隆武帝从祀道周，并乞路引北上收敛道周遗骸，未果。上述行事，散见于该谱行文中，并采用自叙的语气。在道光九年黄鸣盛刊本中，卷首附有《明纂修弟子姓氏》：“漳浦张天维中贲、朱垣伯勤，龙溪庄起俦子鹤、侯世灌晋水、郭万

完巩侯、王经邦丰功、杨天宰玉成、庄六成济鹤、朱用光元绩、李时宗六甫、刘元长仁威、赵兴樾楚材、钟正岳视公、柯宰季容，平和张瑛镇璞。”这份名单显然是以资辈和籍贯作为排名顺序的，在这些道周闽南弟子中，张天维曾任知府，所以名居其首；朱垣是道周女婿，故得列其次。假若这份名单不是伪造的，则该谱属于集体撰写，而谱中多有庄起俦自叙，表明他至少是主要执笔者。

笔者认为该谱是为订补《洪谱》而撰的，证据有四：第一，两谱文字颇多雷同，表明必有相沿关系；第二，《洪谱》是在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的道周遗作的基础上撰成的，反之，并没有资料表明庄起俦也曾经作过类似工作，所以《洪谱》极可能是开先之作；第三，《庄谱》更详，最典型之例有如：记叙了崇祯三年道周主考浙江乡试时拒绝私谒之事，事关道周人品，以及次年道周被劾“非法割榜”而在京候查将近一年，又受罚俸一年处分的事由真相，如此重要的事，很难想象会由《洪谱》从《庄谱》中删去，所以当是《庄谱》的增补。道周拒绝私谒之事，有所撰《自明试务疏》为证。第四，虽然庄起俦加入道周抗清队伍时，洪思年仅12岁，表明庄起俦比洪思年长，但是《洪谱》康熙四年以前脱稿时，洪思未逾33岁，所以庄起俦这时仍可能在世。

在比较《洪谱》与《庄谱》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庄谱》清陈寿祺校本所注“《洪谱》略同”之处，实际上往往不乏重要的差异，例如：（1）事关道周学术及思想渊源方面，有二例：一例是万历二十年，《洪谱》说道周“从里人讲业于此”（按指“渔鼓溪之上”），而《庄谱》却说“从伯兄讲业于渔鼓溪之顿坑者凡数年”；另一例是万历二十六年，《庄谱》增补了一事：道周“喜谈黄白之术，有弃家腾举意。适江西二王子至，先生修刺伏谒，言丹砂可化为黄金，其说有验。而是时神宗静摄，颇好道家言。先生遂作书，将因王子上朝”。（2）事关道周早期理

学思想及学术活动、影响方面，如《庄谱》删去了《洪谱》所记的万历四十六年道周与来漳州校士的福建学使岳和“探讨罗文质公、李文靖公”（按指宋代理学家罗从彦、李侗的理学思想）。

（3）事关道周政治抱负及言行方面，如天启四年，《庄谱》增补了一事：“按先生疏有‘初散馆，请使朝鲜’之语。”道周该年请使朝鲜，有《慎喜怒以回天疏》和《感恩疏》为证。（4）事关道周家事方面，如《庄谱》增补了崇祯元年道周安葬原配林氏于漳浦北山，以及迁葬祖母、伯父、叔父之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虽说《庄谱》订补了《洪谱》，但也删去了一些重要的记述，所以《洪谱》仍有其价值，上文所举万历四十六年道周与岳和论学等事，可见一斑。

尽管《庄谱》和《洪谱》都颇有文献之征，但也不免有所疏讹，其典型者如下例：（1）道周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因江西巡抚解学龙荐举而被崇祯帝疑为结党，逮入诏狱，八月初起因在刑部监狱，十二月底移囚北镇抚司拷问，次年五月二十日移回刑部拟谳，十二月十九日获释。关于道周因在这二所监狱中的时间、顺序、次数，《洪谱》和《庄谱》的记述都显得杂乱失序。

《洪谱》失误在于洪思对道周这段经历不甚了了，这有他注释道周此期《与唐伯玉书》时误说该信撰于“庚辰（崇祯十四年）十月在北寺（按是北镇抚司的俗称），时犹未过西库（按是刑部的俗称）”为证。看来庄起俦对道周这段经历也未辨明，只得沿用《洪谱》之讹而已。（2）道周《狱中乞恩疏》抄附了崇祯十四年十月御批，可是《洪谱》和《庄谱》却说该疏作于“十一月刑部拟谳”之后。（3）隆武帝在隆武元年七月十二日给何成吾兄弟的敕谕中自忆“闰六月初七日监（国）”，此事并有《思文大纪》、《所知录》的记述为证，但是《庄谱》却说“拟于闰六月初八日行监国事”。（4）道周《食尽兵单请自黜疏》自忆“臣

自九月二十五日往崇安”从而跨入江西抗清，可是《洪谱》却说道周“遂于九月十九日同诸将出关”。

三、《郑谱》

作者郑亦邹（？—1709），字居仲，号白麓，福建海澄（今属漳州市龙海市）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与洪思有所过从，四十三年七月曾以所撰道周传记（片断存于《黄漳浦集》卷首）请教于洪思，四十四年洪思逝世又为撰《洪石秋子传》。四十五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假归。四十六年，被福建巡抚张伯行聘为福州鳌峰书院学正，与山长蔡璧子世远结为忘年之交。有门人陈先登、郭成郭、郑溥等。四十八年稍前，张伯行荐入纂修馆，未赴而卒。藏书之富，“几甲郡中”。博学有才名，倡建南屏文社，一时云集三百人。著述十余种，仅存康熙四十一年所撰《明季遂志录》和该谱，以及道周传记片断。曾致力于道周遗作的搜集，编成《黄石斋先生集》50卷，据清陈寿祺比勘，该集可补洪思编《黄子录》的凡127篇（但也有74篇是《黄子录》有而该集所阙的）。

《郑谱》对《洪谱》和《庄谱》的订补，据《庄谱》清陈寿祺校本和《金谱》的援引，至少有3处：（1）在天启五年处，补叙了道周不惧魏忠贤威胁，一反经筵展书官膝行进书的惯例，勇敢地平步进书之举（有道周僚友黄景昉《黄道周志传》，以及道周崇祯四年六月《辨仁义功利疏》所忆“侍经筵仅一日，忤珰而去”，同年或稍后所撰《刘侍御传》所忆“予既以讲筵获罪”为证。）（2）在弘光元年处（按应是隆武元年），补叙了郑芝龙拥兵专政，与道周争班于朝宴，所以道周绝望而自请北上抗清之事（有道周此期《行都求去疏》、黄景昉《黄道周志传》、明钱澄之《所知录》、明查继佐《国寿录》等为证。）（3）《洪谱》和《庄谱》把道周隆武二年行事合入元年，而《郑谱》另立隆武二年这一条，符合年谱体例。

四、《黄谱》

笔者未见该谱及其行世的准确记载，所见是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的著录，说是道周孙玉璘（字文伯）所撰，版本不详，所据是清王源《居业堂文集》的著录。

但是，笔者查清王源《居业堂文集·黄忠烈公年谱序》，及清陈寿祺等《重纂福建通志·黄道周传》所附清陈梦雷为黄玉璘出示的道周年谱所撰序文，实际上都没有明确地说是黄玉璘所撰：前者只说“公诸孙近始出应试，德绍（按指道周第四子黄子平的长子）文章最古雅，选拔入成均馆（按指官学）；玉璘需次为县令。玉璘字文伯，工诗文，磊落多义慨，庚辰（康熙三十九年，1700）与予订交都门，出忠烈公年谱使为序”；后者也仅说：“梦雷戊寅（康熙三十七年）蒙恩自辽左召还京师，得交公孙文伯，文伯出公年谱见示，属梦雷一言，梦雷敬诺不辞。或诘之曰：‘文伯幼丁兵燹，三俘三赎，至于遁逃易姓。卒归，诸父冥冥默相，不可不谓非忠烈公之灵。然文伯戮力圣朝，随征楚蜀黔，挽输边塞，又大殊忠烈公之志！子之序之也，将谓何？’梦雷应之曰：‘不然……’。”所以，黄玉璘未必撰有道周年谱，他向陈梦雷和王源出示的道周年谱，很可能是康熙四年前已向世的《洪谱》或稍后撰成的《庄谱》。黄玉璘，是道周长孙（长子黄子中的长子），生于顺治七年（1650）至十年之间，其余情况如这里援引的王源、陈梦雷的序文所述。

五、《亨阳谱》

仅见《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著录而已，姑存待访。

庄亨阳（1686—1746），字元仲，号复斋，福建南靖龟阳乡人。业师戴盼，与《郑谱》作者郑亦邹有所过从，事见《福建通志·郑亦邹传》。亨阳，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五十七年成进士，授山东潍县知县，母忧归，遂家居侍父。乾隆元年（1736）荐为国子助教。迁吏部主事。六年，特授德安府同知。十一月，

擢徐州知府。八年，迁分巡淮海道。以积劳视灾核赈引发旧病而卒。学通经史算术，有《算法书》、《河防书》、《秋水堂集》等。深为杨名时、方苞等人所重。与蔡德晋等合称“四贤”、“五君子”。传见《清史稿》、《东越儒林后传》、《〔光绪〕漳州府志》、《福建通纪》等。

倘若真有该谱，则不当题作“黄忠端公年谱”，因为道周谥忠端是乾隆四十一年事，而庄亨阳早在乾隆十年已死。

六、《金谱》

笔者所见是大连图书馆藏本。另据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上海师范大学也有藏本。

该谱封面题签及卷首书名均作“先儒黄子年谱集成”，版心大题作“先儒黄子年谱”，卷首职衔名作“海昌后学金光耀梅溪氏增辑校刊”，卷首还刊有《年谱校刊姓氏》：“桐城张用禧莘田、秣陵吴国俊伯瑛、桂林朱樵南垓、海昌陆以钧乙斋、海昌查鼎小白、长乐梁尧辰伯思。”

金光耀，除了该谱职衔名表明他别名梅溪，浙江海宁人氏之外，《海宁州志稿》说他曾任“同安厦门”（当时厦门隶属同安县）的“巡检”，但是《同安县志》以及《爵秩全览》，所列清代巡检名单，均不见其人，或是遗漏了。

张用禧，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莘田，桐城人，此外文献不足征。《桐城续修县志》有张廷佩者，亦字莘田，是“文端”胞侄，若“文端”指康熙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则该张廷佩非张用禧也。

吴国俊，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伯瑛，秣陵（江宁府）人。此外，《续修江宁府志》有传：“字伯瑛。分书（按指隶书）仿文衡山（按指文征明）一派。后官福建盐大使。”但《福建通志·职官志·盐法道》失载。

朱樵，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南垓，广西桂林人。余不详。

陆以钧，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乙斋，浙江海宁人。《海宁州志稿》说他是“桂子。字秉之，号乙斋，又号尚左生。监生。中年以右臂病废，弃举子业，习左手书，摹钟、王，极古媚”，著有《心太平居随笔》十卷、《乙斋吟草》十卷、《乙斋四六文章》十卷。

查鼎，该谱表明他别名小白，浙江海宁人。《海宁州志稿》，有位“查元鼎”，字荭舫，号小白，诸生。尝从军入闽海，卒于淡水厅，著有《纓红院诗稿》、《草草草堂诗钞》六卷。看来此人即查鼎。《淡水厅志》，未录其名。此外，《海宁州志稿》中还有二位“查鼎”：一位字洪受，号实园，诸生，有《一经堂文集》；另一位字凝之，监生，曾任浔美场盐课大使。

梁尧辰，据该谱编校姓氏，别名伯思，福建长乐人。又据《长乐县志》，他是梁上国的孙子，梁章钜的从侄，道光十七年（1837）优贡。余不详。

从上述7人的已知简况看来，他们大体上是与福建或浙江海宁有关的小官吏或文人。他们是如何“集成”或“增辑校刊”该谱的呢？据笔者看来，他们实际上是取《洪谱》道光本（道光二十四年曾省、林广迈、林广荻校刊本）或同治本（同治十年曾天南、曾文贵重刊道光本）为蓝本（有道光本眉批及旧款为证），窜入《庄谱》陈寿祺道光十年刊本的部分文字，摘取《郑谱》片断作为夹注或眉批，是一部拼凑、抄袭之作。首先，谱文和卷末旧款“洪思浩士述”以及眉批，均表明该谱是以《洪谱》道光本或同治本为底本的，然而对此不仅不作任何说明，反而在卷首按语中窜入《庄谱》陈寿祺校本的卷首按语（其中有“以庄氏为定本，洪氏附之”的话），将使读者莫名其妙。其次，他们照原格式抄袭《洪谱》道光本的眉批作为自己的眉批，也未作任何说明，显然有掠美之意。其三，窜入《庄谱》陈寿祺校本的部分文字，也未加任何标识，破坏了《洪谱》的原貌。所幸它还能以一

些夹注或眉批的形式保留了《郑谱》片断（真伪待考），在当今《郑谱》难觅的情况下，可以让人略窥一斑。鉴于它抄袭了《洪谱》道光本或同治本的眉批，所以它应是道光二十四年以后甚至同治十年以后编成、刊成的。又据这7位编校者的籍贯和宦游地，以及卷首《年谱编校姓氏》背面所刊“福州王友士镌字”1行7字，所以笔者认为它们可能编刊于福建或浙江，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综上所述6部年谱中，《洪谱》最早出，而且颇有文献之征，又有一些可与《庄谱》互为补充、印证的记述；《庄谱》次早出，是为订补《洪谱》而撰的，但也有一些重要的遗弃；《郑谱》晚于洪、庄二谱，且较简略，但有所订补；《金谱》是抄袭拼凑之作，但略存《郑谱》片断；《黄谱》和《亨阳谱》恐是原无其书，姑存待访。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